

黄坚立 著



难展的双翼：

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
困境与决策：1927~1949年



商務印書館

难展的双翼：

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
困境与决策：1927～1949 年

黄坚立 著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
1927~1949年/黄坚立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ISBN 978-7-100-07161-1

I. 难… II. 黄… III. 学生运动—研究—中国—1927~
1949 IV. D4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 第 09132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难展的双翼:

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

困境与决策:1927~1949年

黄坚立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7161-1

2010年6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32

201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9 1/2

定价:26.00元

英文版序言

一般学者研究 1949 年革命前的中国，都不免会从政治、军事或知识界精英方面入手。黄坚立则从对国民党在学运政策方面的条分缕析中得出结论，新时期的学生运动，实质上乃脱胎自中国的一种传统精英精神。这种精英精神来自文人学士，他们对文明国家的产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也常出现在许多远古以及中古社会中。这种精英精神与那些源自血统，源自强勇、无私和仁慈等的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文人精英对社会之影响和推动，尤其巨大，其影响力也较其他地方来得长远。这种传统的文人精英精神很容易转化成现代正规教育下的学子精英精神。这批现代学子精英的人数虽然还少，但已出现逐渐增多的趋势。简单地说，中国高级中学及大专院校的学生虽然确曾秉承文人精英的传统，他们的力量却随着人数增加而日渐壮大。他们集中在市镇里，深受来自西方以民主和民粹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新思想所激励。

上述现象,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尤为显著。有组织的学生运动,于 1919 年“五四”运动时达到了第一个高潮,1925 年“五卅”运动时再次得到加强。此后,青年学生便成了各界政治领袖争夺的对象,尤其是在国共合作时期。到了 1927 年,随着学生们在北伐胜利中所做出的贡献,一种难以为中国政治体制所能容纳的,与“忠诚的反对派”颇为相似的新观念便在学生中产生了。学生的重要性,确曾在 1924—1927 年间,引致国民党内部的孙中山亲信与共产党伙伴间的不和。两派都意识到学生的潜力,唯在如何最佳运用于新中国之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分歧。一派期望学生能为刚刚获得统一的新政权提供急需的专业服务;另一派则期望学生投身于政治启蒙大军中去,为爱国运动提供正确理想和激发道义热情,发挥关键作用,以便铲除腐败军阀、叛徒与勾结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分歧,在清党肃共后,仍长期存在于国民党内部,挥之不去。黄博士对国民党掌政 20 余年期间所作的研究,有力地说明要驾驭这类新型学子,确实不易,掌权者处理不当就往往会变成了政治化的问题。他的研究对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认识裨益不少。长期以来,人们都视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回应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失败战略,两者在试图动员和掌握学生活动分子力量方面,也颇相近似。但是,很少人认识到的一点

是，三青团曾被充作为消弭学生向政权挑战的工具，而且，其最终目的是将学生逐出政治舞台。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一种矛盾而夭折的手段，即试图利用三青团作为一股新的政治资源，来使国民党本身得以恢复活力而获得新生。

黄博士对 1938 年三青团成立之隐晦动机所作的细心探索，特别令人感兴趣。此前的研究者大多把视角投向该时期学生界内极具戏剧性及功效卓著的行动上去。有关这方面的不少论著都未涉及国民政府的确切用意。在述及国民党政府当局操纵青年的目的时，大多显得过于简单，甚至谬误迭出。本书著者之所以这般不厌其详，无非是要照亮围绕在这一个课题上的许多盲点。

从黄博士的研究中，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而这同时也是一个极具普遍性的原理：每当社会与政治制度不健全，时代动荡不安，权力斗争白热化时，学生们都有可能受到鼓励应召而起，要求改革或向一方靠拢。一旦政权稳固，政治领袖即逆向而行，要求学生埋首书本，掌握必要知识技能，以便投身于富国强民之建设大业中——在旧时代，这些人可能成为士绅或地主阶级，在新的时代，则将成为专业人士及拥有屋业资财的中产阶级。他们将提供振兴国家、创造未来

的动力。

王赓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1996 年 2 月于新加坡

中文版序言

早在 20 世纪初,李大钊就颇具远见地意识到,青年的力量可以使一个旧社会获得新生。热血澎湃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了中国的“五四”运动,身处这一运动中心的李大钊,极力鼓吹新青年为推动社会再生的一股神圣力量。在整个 20 世纪,学生运动连同工人斗争和农民革命,成为象征人们为社会正义而不屈抗争的一座座丰碑。中国历史如此,世界历史也是如此。

从理论上而言,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这两股重要的历史浪潮相比,学生运动明显居于次要地位。然而,在 20 世纪历史上,学生运动却似乎比工农运动更历久不衰。风起云涌的“学潮”不断激荡着中国大地。至今,许多相关问题都仍待探索:我们如何能构想一场同时波及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全球性运动?与此同时,学生运动是否也已随着 20 世纪的结束而悄然落幕了?它的历史时刻是否真的已经一去不返?

黄坚立教授的著作通过丰富而翔实的研究,从宏观

和微观两个层面，准确地把握了学生运动在中华民国史中的历史角色。他纵观 20 世纪的学生运动，然后将其研究焦点集中于一个重要的具体问题上：国民党在其执政时期如何试图控制学生运动并对其进行“去政治化”？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他对国民党内复杂的派系政治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考察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根基不稳的国民党政权通过哪些政策和机构来使学生运动“去政治化”，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忠于政府的公民运动。更为重要的贡献，则是他对于国民政府学运政策失败原因的深入解析和评价。当然，他说明了国民党在 1938 年至 40 年代初这段时期之所能暂时遏制反对意见的原因和手段，但在更广的层面上，他则揭示了国民政府无法满足学生诉求的事实，这在 1946 年至 1949 年国民党发动内战期间尤为明显。

我们今天也许难以理解那些学生们为何以及如何为了一个更崇高的诉求（尤其是社会正义）而聚集组织在一起，甚至流血牺牲。正如黄教授所指出的，即使学运活跃分子仅占三四十年代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其影响也足以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不管我们怎么看待这种变化，我们都应意识到，学生运动是 20 世纪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现象。20 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黄教授的著作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中

国学生运动的政治和“去政治化”，提供了可贵的素材和视角。

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

暨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2009 年 2 月于新加坡

鸣 谢 （一）

此一研究课题，若无许多师长、同事、朋友和有关部门帮助，是很难成书的。此课题原为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所的博士论文，以之为基础，经深入再探讨、补充修改后撰成。研究经费主要由澳大利亚政府联邦协会奖学金基金和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导师奖金（Senior Tutorship Scheme）提供。

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众多档案馆、图书馆同仁的热情帮助，他们为我提供了许多方便。如：澳大利亚大学 Menzies 图书馆亚洲部、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东方部、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阳明山档案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国父纪念馆、台北调查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新加坡国立大学总图书馆。对此本人谨表由衷谢忱。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许多个人所提供的思

想上、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论文导师、为本书作序的王赓武教授。他在我论文写作的各个阶段都给以耐心细致的指导。此外,他还花了很多时间给我讲述他对中国通史的理解,以及他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所应扮演角色的观点。他现留居新加坡,使我有机会进一步汲取他的学识。我的其他导师教授们,如 Hector Kinloch、John Fincher 和骆惠敏也都曾经仔细阅读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的其他澳大利亚学术前辈、师兄、师弟们,如 John Fitzgerald、Edmund Fung、Lincoln Li、苏维初、祝敏申等都对该书提出很多有益的见解。Peter Dennis 夫妇给了我无限的精神支持和家庭般的温暖,使我在澳大利亚度过了几年黄金时光。

择定本课题进行研究,起始于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毕业之时。以此作为我进行民国史研究的开端,这要感激萧启庆教授的启迪。尽管他是位元史专家,但他通过业余阅读掌握了广博的中华民国史知识,加上他的亲身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以及耐心的指导。他最近返回台湾执教,我深感惋惜。幸好还有吴振强、孔丽莎两位教授继续留新任教,这对失去良师指导的我也算是一个补偿。历史系的其他教授,如黄麟根、Eunice Thio、Ernest Chew 和 Edwin Lee 等,都对我的学术研究影响

不小。

另外,陈明録、Jerome Ch'en、Jack Gregory、Lee Ngok、Jeffrey Wasserstrom、Thomas Heberer 和蓝平儿等教授的积极批评和建议,使我出版前的最后定稿工作变得容易得多。Peter Borschberg、Daniela Kessler、Marion Saville、Sian Jay 和 Sai Siew Min 也在编辑方面给予无私的援助。本书最后能够付梓完全归功于黎辉杰神奇的电脑技巧。

最后,我要感激我的父母,他们流血流汗,含辛茹苦地为我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使我从小打下了坚实的学习基础。我也要答谢我的爱妻蔡荣华,感激她能够面对作为一个学者太太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对我的爱子涵敏、涵伟深感抱歉,为了我的求学和事业推迟了他们的出世,更要感谢他们现在给我带来许多的欢乐。

黄坚立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

HUANG JIANLI

*The Politics of Depoliticization in Republican China:
Guomindang Policy towards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 1927—1949*

(Bern: Peter Lang, 1st Edition 1996, 2nd Edition 1999)

鸣 谢 （二）

拙著的翻译工作持续了数年之久。翻译学术著作是一件劳神又费时的事情，而如果希望达到信、达、雅的高水平，则更具挑战性。此中译本最终能得以完成并出版，离不开很多同仁的协助。

译本的初稿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孙修福先生执笔，新加坡的李发沈先生则负责后续的修改工作。此后，数位中文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先后阅读了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们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天石教授、台湾清华大学暨“中央研究院”院士萧启庆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教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张瑞德教授等。我的多位历史系研究生和本科生也在该书的编辑工作和电脑技术方面提供了关键性的帮助，包括魏兵兵、谢明达、张静、黄应斌、方小平、舒圣祺、谢枝麟、黎辉杰等。

中译本的最终出版得益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吴小安教授的鼎力相助。数年前，我们定交于新加坡。此后，他不

但给予我不断的鼓励,而且在我和出版社之间积极进行协调工作。在译稿的杀青阶段,我们有机会再次共事,友谊也更见深笃。此外,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牛大勇教授和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国刚教授,也对中译本的出版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建议,使我受益匪浅。当然,该中译本的整个出版过程,离不开商务印书馆著作室主任常绍民先生热心而积极的工作。他全程督导了书稿审阅的各个阶段,并对具体出版事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建议,我对此深表感激。

杜赞奇教授刚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转入新加坡国立大学,我也因而有幸获得了与他进行更加密切交流的机会。除了切磋治学之道外,他还仔细阅读了拙著并为中译本撰写了序言,与此前王赓武教授的序言相得益彰,恰成双璧。

此外,需要提及的是,该书所采用的照片大部分都是商务印书馆提供的。其余少数几张,则是在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乔光辉教授的帮助下,从东南大学档案馆获得。本书的出版也获得了新加坡的李氏基金及陈氏基金的慷慨赞助。

对于以上提及的所有人的热心支持和帮助,我都深表谢忱。书中存在的任何问题和不足,自然都由我个人

负责,惟祈学者方家不吝指正与海涵。

黄坚立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

2009 年 2 月于新加坡

目 录

英文版序言	1
中文版序言	5
鸣 谢 (一)	8
鸣 谢 (二)	1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范围	1
第二节 近代学校和学生	6
第三节 20 世纪中国学生运动概况	12
第二章 政策转向之议	25
第一节 清党后的临时措施	25
第二节 早期的倡议	35
第三节 后期的改进	44
第三章 政策路线之争	54
第一节 民众训练委员会不同政策的出现	54
第二节 民训会倡导新路线的幕后动机	63
第三节 派系重组与学运法规的颁布	70